

从雅典到明朝：

瘟疫下人类的悲情与抗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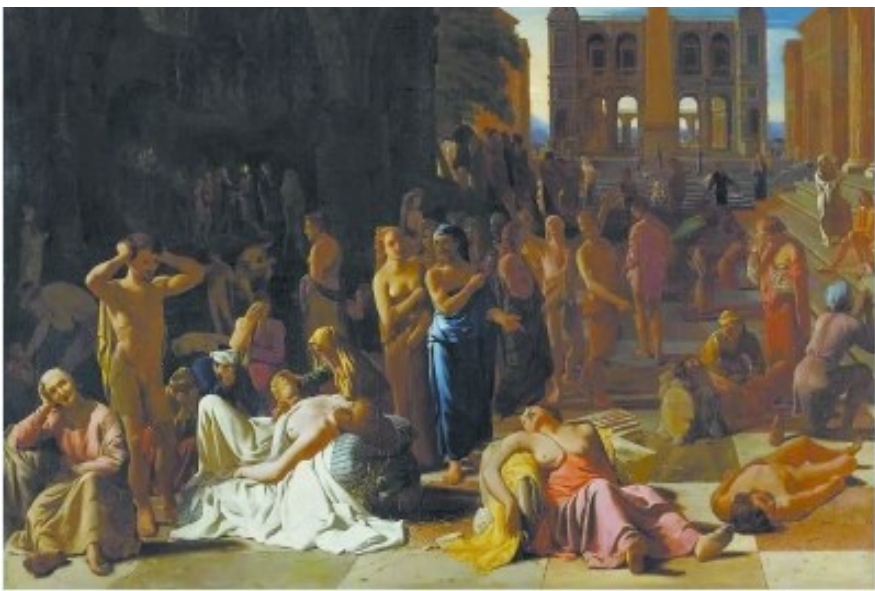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详细记载的第一场大瘟疫

公元前430年，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，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。但是，谁也没有料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雅典。几乎在顷刻之间，从海边到内陆，从城镇到乡村的大片土地，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，发热、呕吐、极度口渴、失去知觉的人越来越多……死亡的气息蔓延在雅典的每一个角落，一度被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崩溃。

史学家修昔底德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记载：“瘟疫是从比雷埃夫斯进入雅典的……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，也是唯一食物及补给的来源。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地区也有发生瘟疫，但影响较小”。雅典成为疫情的重灾区，几乎有一半的人都病倒了，瘟疫摧毁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。修昔底德无限悲痛地记录着当时的惨剧：“这是一场巨大的浩劫，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对任何法律法规都变得漠不关心……”

更可怕的是，面对疫情，人们束手无策，不仅平民百姓大量死亡，连城邦的统治者、著名改革家伯利克里也死于这场瘟疫。修昔底德在史书上记载着：“医生与病人的接触最多，死得最快。在人满为患的雅典，这种疾病导致约25%的人口丧生。看到雅典燃烧的葬礼火柴的场面，斯巴达人撤回了他们的部队，他们不愿冒险与患病的敌人接触……”后世有些研究认为这场瘟疫至少导致雅典一半人口死亡，但不论是四分之一还是一半，这都是一场骇人的人间惨剧。这场瘟疫也改变了雅典的历史，雅典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，在后来与斯巴达的战争中连连失利，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。

至于这场骇人听闻的雅典大瘟疫结束的原因，民间一直有传言是医生希波克拉底(就是后来所有从医者都需要尊奉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的作者)发现雅典很少有铁匠感染瘟疫后，意识到炽热的火焰可以驱赶瘟疫。当雅典人手持火把，几乎要点燃整个城市后，瘟疫终于散去。对这个说法，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，起码在修昔底德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并无相关记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当温度提高时，空气中的病毒就会自然消失，可能是这场瘟疫结束的重要原因。当我们仔细观察历史后会发现，有很多类似的瘟疫，都来去匆匆，它们几乎毫无征兆地暴发，又莫名其妙地消失，但在此期间，有太多无辜的生命要付出不必要的牺牲，甚至一些国家或文明都因此陷入无尽的黑暗。



西方绘画中的雅典瘟疫

与战乱相伴相生的瘟疫

雅典大瘟疫是人类有史以来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，但事实上，有很多残酷的历史并没有被记录下来，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的可怕病毒，可能只是古籍上一笔带过的一句话，甚至一两个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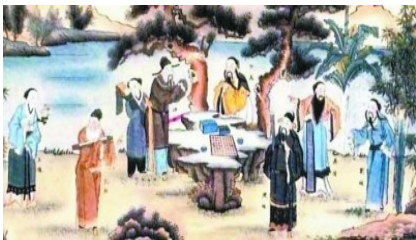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，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，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，比如“疾年”“疢疾”等词，就曾出现在记载的祭祀占卜活动中。但当时医疗条件落后，发生了瘟疫，人们只能通过鬼神之事来祈求逢凶化吉。那是一个人命微贱的特殊历史时期，当大量奴隶与战俘倒毙在病毒面前时，商王与贵族首先想到的是远离这些可怕的群体，甚至很多人与牲畜一起，都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，被当做献给祖先与鬼神的祭品来活埋或斩杀。因此，后人看到上古时期有关瘟疫的记载反而比近代要少，并非因为当时没有严重的疫病，而是记载丢失，或根本不会当成大事来记载。

随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与科学的进步，人们对瘟疫的记载越来越详细，对防疫的探索也越来越多。但尽管如此，可怕的瘟疫还是会不时出现，尤其是社会秩序混乱或战争期间，更容易暴发严重的瘟疫。比如著名的东汉末期的“建安大疫”，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，“建安七子”有五人没能熬过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的这个可怕的冬天。

与雅典大瘟疫相似，“建安大疫”也发生在战乱期间，曹魏政权即将粉墨登场，魏汉交替的历史正在上演，崩坏的社会秩序亟待重建。当时，几乎没人注意到战争与疫病的关系，因为战场上死掉

的将士太多，流离失所、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也太多，苟且偷生地活下去，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。当瘟疫摧毁一个地区后，崩溃的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建制，还有社会伦理。在乱世缺乏合理的动员机制与防控举措，人们只能听天由命。

曹魏建立后，随着社会秩序在中原地区的恢复，瘟疫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而在南方，或许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，大规模的瘟疫相对较少，但具体在一个区域的疫情却时常出现，甚至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人口流动，病毒也飞速传播，像蜀汉南征西南夷时，经常遭到瘴气的伤害，大量将士患病、死亡，这其实也是小规模瘟疫。《三国志》中也记载了吴国将士远征海南时遭遇的严重瘟疫：“吴孙权赤乌五年，大疫”，“秋七月，遣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、儋耳。是岁大疫，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”(此处珠崖、儋耳便是今天的海南岛)。但等人们解决了水土不服问题后，病情自然消失，或者说，人们已经产生了免疫力，可以与病毒长期相安无事地并存。



建安七子

中国防疫体系的动员机制

与南北朝几乎同时，一场可怕的瘟疫沉重打击着西方的拜占庭帝国。从541年到599年，从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镇，先后暴发了五次严重的瘟疫，史称“查士丁尼大瘟疫”，它至少造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，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将近一半，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五千人死亡。正如对拜占庭学研究颇深的历史学者陈志强教授在《世界历史》上曾刊文所讲的：“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，其中君士坦丁堡、安条克、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，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，而西班牙东南部、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暴发鼠疫，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”——这场瘟疫不仅彻底毁掉了拜占庭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，也严重波及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，对地缘政治与文明演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相比之下，在中国发生瘟疫后病毒的传播，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。这一方面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，另一方面也有历代中央帝国动员机制较强有关。比如，《明英宗实录》记载了景泰六年南京瘟疫暴发时的惨状：“死者相枕连途，生者号啼盈市。弃家荡产，比比皆是；鬻妻卖子，在在有之。”疫情发生后，明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，包括开仓赈民、减免赋税，从其他未受灾地区调拨物资，以解决民众之急需。而且，赈灾情况也与当地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，赈灾不力甚至借机贪墨之徒，轻则免职，重则上刑。

正如《明史》中讲到的“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，六年再考，九年通考，始行黜陟之典”，有这套管理考核机制在，当地的“父母官”不敢不认真对待，史书上也 不乏那些赈灾济民的廉吏的故事。但从根本上说，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解决瘟疫与灾荒的行政体制，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套行政体制是否运转灵活，但总归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办法。

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，这些举措在历史上生根发芽，随着近代科学防疫方法从西方传入，到现代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防疫体系，这些举措不断配合医疗技术的革新而变化。但这套基于中国地缘特点与行政管理方式的防疫体制，却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原始的雏形，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化。

(本报综合)

世间万象

“玫瑰白菜”面市



近日，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侯喜林教授研究培育出的“玫瑰白菜”正由学生创业团队策划包装，推向市场。“玫瑰白菜”形似玫瑰，还具有耐寒耐冻、维C含量高、味偏甜口感好等特点。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学生创业团队成员正在展示“黄玫瑰白菜”。

小猪运动会“萌”趣横生



近日，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假日绿岛休闲农场，小猪在进行跨越障碍比赛。当天，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假日绿岛休闲农场举行了一场“萌”趣横生的小猪运动会，一群憨态可掬的小猪进行了赛跑、跨越障碍、跳水、游泳等项目的角逐。

蜂鸟戏花



在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，一只叉尾太阳鸟在红苞花枝头采蜜。初冬时节，福建省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红苞花竞相绽放，吸引了大批叉尾太阳鸟前来采蜜。叉尾太阳鸟又名亚洲蜂鸟，是福州特有的“明星鸟”。

五胞胎雪虎宝宝亮相



近日，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，工作人员带着五胞胎雪虎宝宝一起亮相。当天，山东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五胞胎雪虎宝宝首次与游客见面。据悉，雪虎属于孟加拉虎变异种，后代抵抗力低，易夭折，这次能一下生出5胎雪虎，还全部存活，非常难得。五胞胎雪虎宝宝四雌一雄，目前健康状况良好，萌态十足。

会画人像的机器人



近日，机器人在为一名参观者绘制人脸图像。当日，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，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展出的一款智能识别机器人，现场免费为观众绘制人脸图像。

(本报综合)

唐代诗人在长安的“宅”生活

为了战胜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，人们纷纷响应号召“宅”在家里，这是阻断病毒的最好办法。

如果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大唐首都长安，那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，诗人荟萃的地方。那时的诗人们也有“宅”生活吗？他们又能“宅”出什么花样呢？

白居易：编成“国考指南”

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因为参加“国考”，而在长安的上都华阳观里过了一段“宅”生活，结果“宅”出了一本书。

贞元十八年冬，白居易来到长安，和朋友元稹一起参加了吏部的“拔萃科”考试，白居易名列甲等，元稹考中第四等。第二年春，他们一同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秘书省是皇家整理图书的机关，校书郎的职责就是管理“邦国经籍图书”，这是一个九品小官，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。

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(806)，为了广揽人才，朝廷举行了制举考试，这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大考。唐代的制科，考取后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官职。制科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，所谓“策”，就是回答皇帝的“问”。皇帝所问的当然都是当前的时政问题，借以发现考生处理问题的才干。

这时的白居易和元稹因校书郎任期届满而赋闲，他们自然不能放过这个登高的机会，为了参加制举考试答好皇帝的策问，他们二人决定找个地方“宅”起来，他们发现长安上都华阳观非常僻静，适合搞学问。于是二人就来到这里，租借了一个房间，开始为这次考试用功作准备。白居易后来写过一首诗，讲述了此时的境况：“季夏中气候，烦暑自此收。萧飒风雨天，蝉声暮啾啾。永崇里巷静，华阳观幽闲。”白居易和元稹在华阳观中“闭户累



月，揣摩当代之事，构成策目七十五篇”，白居易和元稹在这里“宅”了两三个月，他们竟然“宅”出了成果，写出了七十五篇策目。后来，白居易把这些文章编成四卷，这就是有名的《策林》。该书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刑法、吏治、风俗等各个方面，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堪称当时“国考”的经典教材。这些精心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，给白居易的“国考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一段生活对白居易和元稹二人的思想、友谊也有了新的增进和提高。

这年四月，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唐宪宗亲自组织的“才识兼茂，明于体用科”的策试。唐宪宗针对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情况，问国家如何理政才能取得成效？面对这个问题，“宅”了三个月的白居易可不是吃素的，自然是有理有据、针砭时弊、侃侃而谈。

韩愈：塑造经典形象

再来说说韩愈，韩愈素来有大志，一心向上，他也曾有几段在长安的“宅”生活，其中一次，竟写出了千古名篇，为普通泥瓦匠立传，可谓开了先河。

韩愈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和爱国情怀的人。在贞元三年韩愈20岁时，他从江南的宣城进京参加科考，曾写下了一首



《出门》诗，诗里展示了他对来长安参加科考和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憧憬：“长安百万家，出门无所之。岂敢尚幽独，与世实参差。古人虽已死，书上有其辞。开卷读且想，千载若相期。出门各有道，我道方未夷。且于此中息，天命不吾欺。”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支撑，韩愈一直都是最上进最用功的。

贞元十六年冬，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，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，向他从政的梦想发起再次冲刺。为了更有把握，韩愈找了个住处，把自己“宅”了起来，一边准备功课，一边把遇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写出来。这个人叫王承福，是一个泥瓦匠。韩愈被王承福独到的人生观所感染，他决定替这个泥瓦匠郑重其事地写篇传记，题目叫《圬者王承福传》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贞元十七年，韩愈终于通过铨选，给他这段“宅”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，也开启了韩愈政治生涯的新时代。贞元十八年春，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。贞元十九年，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。此后尽管韩愈屡受贬谪，但凭着他的实力，韩愈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大唐政治舞台的中心，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梦想，成就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

李贺：“宅”出千古绝句

最后要说的李贺，他不畏困苦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是他能够持之以恒、呕心沥血，终于“宅”出了千古名句。

任职期间，李贺的工作也不忙，他“宅”居长安，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创作上。当然，李贺并不是一味“宅”居，他有时要到生活中去发掘素材。每次出门，李贺骑着一匹瘦马，肩背一个布锦囊，他边走边思索，吟得佳句，就用随身所带砚砚，在马上写成诗条，投入锦囊。有时满载而归，囊中鼓鼓的；有时终日穷思苦索，竟不得佳句，囊空如洗。

回来后，李贺就“宅”在家里，搜肠刮肚、冥思苦想，试图想出满意的诗句。知子莫若母，李贺的母亲知道儿子勤于创作，更了解儿子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很心疼他。一天晚上，李贺母亲看到儿子写出了不少诗句，又高兴，又心疼，叹息道：儿啊，你非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！李贺那些著名的诗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

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再加上刻苦写诗，李贺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，年仅二十七岁。但李贺短暂的一生，却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，许多是世代相传的名句，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等，可以说都是他“宅”出来的。

显然，唐代几位大诗人的“宅”生活是有意和收获的。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过上的“宅”生活，最终要看这种生活有没有意义和价值，让人们收获了什么？所以，不妨将过“宅”生活的机会作为充电奋斗的时机，把“宅”居当作“闭关修炼”，去学习，去努力地提升自己，让自己“宅”有所得，“宅”得精彩。

(本报综合)